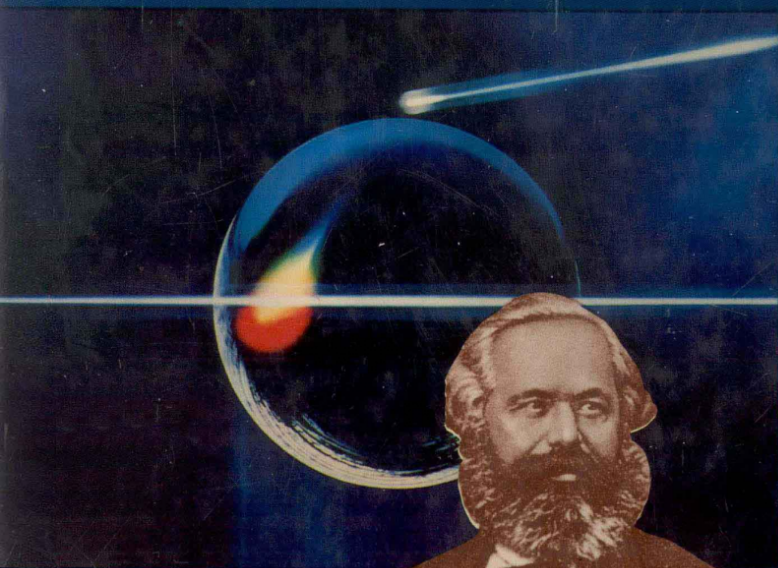


中共党史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

100年



赖钦显 主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百年

赖钦显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年·北京

(京)新登字 071 号

责任编辑：霍海丹

封面设计：郭召明

责任校对：金 文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百年

赖 钦 显 主编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1929 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宫门前甲 10 号

电话：(01)2581570 传真：(01)2581532

印 刷：武汉大学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14.75 印张 374 千字

199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3 年 5 月武汉印刷

印 数：2000 册

ISBN 7-80023-610-2/D·84

定 价：18.00 元(精装)

序 言

刘 继 增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一百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前所未有的、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百年。整整一个世纪里，中国人民在对各种思潮进行了反复比较后，最终选定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并将其付诸实践，中经几代人的不懈奋斗，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起一个独立、民主、自由、富强、团结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在近一个半世纪以前，当“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的时候，中国人还不知道《共产党宣言》这一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标志为何物，亦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更无从知道他们的思想。直至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广泛传播了半个世纪以后，中文报刊上才首次于 1899 年出现了被誉为“百工领袖”而著称于世的马克思的名字，那是在是年 2 月《万国公报》所载的《大同学》一文里。同年出版的《大同学》单行本，在介绍马克思的同时，也提到了恩格斯的名字。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并未在中国传播开来。

1917 年俄国革命的炮声，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通过 20 世纪初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逐渐传播开来，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也由被动转为主动。

如同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一样，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历经曲折。就一般情况而论，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即：(1)从 1848 至 1871 年巴黎公社的“风暴和革命时期”；(2)从 1872 至 1905 年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性质而没有发生过革命的

低潮时期；(3)从1905至1956年的更大的“风暴和革命时期”，马克思学说获得了空前的新胜利和实践的检验；(4)从1957年至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再次出现低潮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种种曲折，充满动荡与分化，甚至严重挫折，从而损害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就中国具体情况而言，马克思主义发展却呈现出许多独特之处，这集中反映在马克思理论发展中的几次飞跃上。

马克思理论发展的第一次飞跃是由列宁完成的。列宁根据对20世纪初叶世界历史进程和俄国具体情况的深刻剖析，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必然同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联合起来，社会主义革命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有可能首先取得胜利。十月革命的胜利，检验了列宁理论的正确性。在恩格斯逝世后列宁主义诞生之前，由于第二国际领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糟蹋和他们把殖民地附属国的革命运动排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这传来的是战胜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被列宁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是列宁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由于从建党之始就将马克思主义确定为它的指导思想，致使其没有受到第二国际的影响。这样，马克思理论发展的第一次飞跃，使中共的建设处于一个十分有利的地位。

马克思理论发展的再次飞跃，是由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来实现的，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世界反帝斗争的全局和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的历史实际出发，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革命”的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中共正确地领导农民，团结社会其他阶级阶层，形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以武装的

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开创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指引中国人民在 1949 年赢得了全国的胜利，并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道路。马克思理论的这次飞跃，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它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一大历史跨越。

马克思理论发展的第三次飞跃，则集中体现在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上。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的发展，与之相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云变幻，处于一个多事之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与飞速发展的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探索与发展，充分显示了中共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它是适合中国国情、符合时代潮流和广大人民利益的。这个理论第一次科学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一理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意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它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贡献，它把毛泽东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如果说列宁主义的诞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初创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那么邓小平理论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必将指引我们大大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

围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主题，赖钦显同志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百年》作了大胆创新，理论上多有创见，形式上力求新颖，条理清晰，论证严谨，使本书成为目前这方面为数不多的专著之一。

自从中国人首次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起，至今已近 100

年，即使从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渐地广泛传播算起，至今也有70余年。70年的漫漫历程，雄辩地证明列宁在77年前论述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时所作的科学预见：自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世界历史发展的每一大的时期，“都使它获得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而且，在即将来临的历史时期，“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列宁的科学预见，在这部专著中得到了具体的再现。该书以大量的、详尽的史实为基础，深入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一科学真谛，因而令人信服。

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与建设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人民事业的战无不胜的旗帜，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百年》紧扣这个历史的必然，史论结合，锐意创新，力求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处着眼，探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传入到广泛传播再到发展的历史轨迹，提出并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几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观点。该书在这方面的有益尝试与创新，确实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批判性和战斗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点之一，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不断战胜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也同样遵循着此规律。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和复杂的条件下，同社会上各式各样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同时又批判了来自中共内部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等错误，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统一起来，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科学的理论概括，从而为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不朽贡献。依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这一特点，去构筑自己的理论框架，是该书的又一特色。

总之，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的历史反思与理论研究，不

仅是我们进行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理论探索中一项重大而必不可少的课题,而且对于澄清人们思想上的某些模糊观念或错误认识,对于人们冷静地总结过去和思考未来,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读着这本有一定理论深度而又较有特色的书,使我想起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中的一句名言:“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1993年5月15日

题 记

毛 磊

深圳大学赖钦显同志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百年》一书即将问世。因为本书在酝酿选题和撰写的过程中，我给钦显同志出了些主意，他都虚心接受了。所以，他执意要我为本书的出版写几句话。还因刘继增教授已写了序言，我就用“题记”的形式谈些想法，以作为对序言的补充。

我认为，本书可以说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即：抓住了根本，有独到之处，有突出意义。

（一） 抓住了根本

所谓抓住了根本，就是说中国近百年来最根本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四大的政治报告中也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根本原因是在十四年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本书以这个根本问题为自己研究的对象，以历史发展为线索，史论结合，纵横研究结合，力图对关系中国人民命运的这个根本问题作深入系统的论述，这就抓住了根本。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本书特别着力论述了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一个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作者详细阐述了自鸦

片战争失败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救国的真理的过程。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等，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他们学西方的迷梦。只有在十月革命后，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才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么辉煌的成就，根本原因是在近一个世纪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第二，本书以丰富的史料论述了一个重要原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有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历史包袱很重、情况异常复杂的国度里，把马克思主义真正与具体实践结合得好，是一件非常艰巨的系统工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过失败、成功、再失败、再成功的反复实践过程，才取得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也就是说，在结合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只有争取少犯错误或不犯全局性与长期性的错误。在取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之后，才能把两者结合得好，从而取得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这是一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本书以坚实有力的事实依据和逻辑力量论述了这个规律的具体表现。它告诫人们：切不可因为在结合过程中发生错误而丧失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信仰。否则，就会犯绝大的错误。有的人以1957年到1978年这20年间没有“结合好”为理由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和掌握这个客观规律。如果这本书能帮助更多的人坚定马列主义的信仰，也就发挥了本书的社会价值。

第三，最值得庆幸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艰难历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

性飞跃之后,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又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它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将影响中华民族上百年的历史,必将指引我国人民走上富强康乐的道路,其意义是重大和深远的,本书对此也作了初步的探讨和论述。

从以上三方面可以看出,本书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的论述是严肃认真的,力求系统深入,突出重点,有明确的现实意义。

(二) 有独到之处

早在 19 世纪末,中国即有人开始零星介绍马克思主义,这在中国学术界虽早有论及,但本书对此论述较为系统,这可说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独到之处。按照几十年来传统的提法,认为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才传入中国。即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2 版,第 1470 页)本书系统地说明了百年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毛泽东上述论述的关系。

第一,作者是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此项研究的。关于马克思的名字及其学说在中国报刊上最早出现的问题,说法不一。有的说是 1899 年出版的《万国公报》上连载的《大同学》一书。该书不止一次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有的说是 1898 年在上海由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一书。该书是英国人克卡朴(Kirkup)所著《社会主义史》的中译本。尽管说法不一,但这些说法的共同点却是:马克思及其学说最早出现在中国书刊上的时间应为 19 世纪末。赖钦显同志根据这些确凿的史料,不拘泥于革命导师的个别结论,

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方法是值得提倡的。

第二,要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两种提法,是有很大差异的。前者是指少数人在个别书刊上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影响面很窄,只是极少数知识分子书斋中清谈的资料而已。而后者是指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在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中,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很快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许多人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在工人中进行传播。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正是指的这后一种情况。“介绍”和“送来”的含义是不同的。正是从这种差异出发,本书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时间判定为100年,这并不是否定毛泽东的结论,正是对毛泽东论断的合理补充。

第三,十月革命前,把马克思及其学说介绍到中国来的,主要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派,如朱执信、戴季陶、胡汉民等。他们并不是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而只是吸收其中某些内容当作可资借鉴的思想材料。历史推动某些国民党人接近了马列主义的科学殿堂,但阶级的局限性却使他们在这个殿堂的门口徘徊并最终走到了对立面。尽管如此,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还是值得肯定的。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却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去取得胜利。两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样认识,既肯定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到中国来的历史作用,又与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严格区别开来。

总之,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开始时间放在19世纪末,是有充分根据的。这是本书的一个鲜明特点和优点。

(三) 有突出意义

所谓有突出意义是指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时间,二是地点。

这里讲的时间是指本书撰写与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

这个时间内，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有的人就认为马克思主义也要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在这个历史发展的重要时刻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百年》的问世，就有着突出的意义。因为本书以翔实的史料，深刻的分析，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播种、开花、结果的发展过程。它向人们宣示这个过程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我相信，通过各种宣传渠道，包括像本书这类书的出版，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这里讲的地点是指本书的主编赖钦显副教授身居深圳。这是一个特殊的地点。在赖钦显同志撰写与出版本书的过程中，其他作者所在单位也给予支持，但主要是得到深圳大学领导的大力支持，把本书列为深圳大学建校十周年的献礼项目，这就具有重要的意义。我这样提法，可能有人认为言过其实，太夸张了。我却不以为然。因为对办深圳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有的人认为这是搞资本主义。说深圳“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初南巡谈话中尖锐指出：“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还说：“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这个论断是科学的。因为深圳仍是以公有制为主体，更重要的是政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深圳大学校领导支持本书的出版，这虽然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但“见微知著”，从这个点滴的侧面证明深圳人民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特区建设的。这就是从“地点”这个角度讲本书出版有突出意义之所在。

当然，本书还有不足之处。希望作者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再加以修改提高，使它成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史的一部力作。

我衷心祝愿这本书能成为广大读者喜爱的书！

1993年5月4日于武昌蛇山脚下

前 言

马克思主义从19世纪40年代诞生以后,它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时代,即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和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每一个时代里,马克思主义都是沿着曲折的道路波浪式地发展的。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现在的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进程,大致划分为两次高潮和两次低潮,即从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1871年巴黎公社的第一次高潮;1872年到1904年欧洲处于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时期的第一次低潮;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是第二次高潮,马克思主义进入风靡全世界的发展时期;从1957年到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充满了动荡和分化,发生了种种曲折,是为第二次低潮时期。历史的发展虽然是曲折的,但却说明了一个事实,即马克思主义从最初徘徊于欧洲的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成为当代“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①的全面发展的时期,科学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的时期。

中国人在近代以来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追求中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从最早传入中国至今已近一个世纪,但真正被中国无产阶级掌握则是十月革命以后的事,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事。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期间。中国共产党内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

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20世纪领导中国人民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领袖。今年适逢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我们撰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百年》一书来表示纪念。我们试图在这新旧世纪交替的时刻,在当今马克思主义发展处在一个新的曲折时期,从历史的鸟瞰,从宏观的审视来展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所作的艰苦的努力、创造性的探索和杰出的贡献,以及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程来凸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

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是中国共产党一踏上斗争之途就遇到的一个严峻的课题。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反映了全世界工人运动发展的共同规律,对于各国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对于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它同样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中国的情况不仅和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而且和十月革命前的俄国也有很大区别。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所提出的问题,既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找到现成的答案,也不能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找到现成的经验,只能依靠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地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进行新的创造。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艰巨而又困难的事情。

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成功的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长期的摸索,走过了坎坷不平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也是曲折的波浪式向前发展的,至今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紧接着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是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这次高潮的规模和影响远远超过第一次高潮,其结果

是使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第三次是1979年前后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肇始。讨论的是哲学问题，实质上是政治问题，通过讨论大大提高了党内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水平。这就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准备了条件。结果使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系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本书在写作体例上不同于一般史书，而是相对集中为若干专题来叙述，这样可以较集中而又可多侧面地反映这一进程。

我们纵观三次高潮可以看到：首先，每次高潮都是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而来的。五四运动冲破几千年来顽固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的束缚，代之以科学的和民主的新思想、新文化，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站住了脚，从此以后便势不可挡地传播开来。延安整风运动，是解决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使全党从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就使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成为可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全党的思想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下解放出来，从“两个凡是”即把毛泽东的指示和决策教条化、神圣化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这才有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及其理论的形成。

其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和发展情况如何同中国共产党对国情的认识程度密切相关。对国情的认识就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的认识。中国国情的特点决定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点。对国情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结合的深度和广度。由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的特点和发展状况的复杂多变，中国共产党对国情的认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当历史的发展提出了革命和建设的新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对国情的认识达到了最本质的全面系统的程度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

和发展就出现新的飞跃。反之，就会犯“左”的或右的错误，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早已申明：“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①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的一个伟大成果，其中的基本原理是不会过时的。但是，历史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产生至今的一个半世纪里，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大变化。实践不断向理论提出挑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未论及的事件、现象，如今却是活生生的现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对它作出回答。是用现成的“本本”来裁定新的实践呢，还是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如果是前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永远不可能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以毛泽东为第一代领导核心和邓小平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的实践中吸取养料，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成熟的党，在她的征程中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挫折和失误，但最终都能运用马克思主义找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把事业推向前进。

第四，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在它的发展历程中，会遇到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进攻和抵抗，必须旗帜鲜明地与之进行坚决斗争；也会有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的干扰和影响，必须加以认真的克服和防止。斗争情况如何，将影响着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也关系着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主要是“左”的干扰。1987年4月，邓小平基于对历史的深刻的总结指出：“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1992年春，在总结国际风云变幻和我国社会主义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0页。